

SOCIETY AND
CULTURE SERIES

社 会 与 文 化 丛 书

解读《沟通行动论》

阮新邦 林 端 主编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上海人民出版社

解读《沟通行动论》

阮新邦 林 端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沟通行动论》/阮新邦,林端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社会与文化丛书)

ISBN 7-208-04002-8

I.解... II.①阮...②林... III.社会学—理论—
文集 IV.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2118 号

责任编辑 田 青

封面装帧 王晓阳

·社会与文化丛书·

解读《沟通行动论》

阮新邦 林端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3 字数 209,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0

ISBN 7-208-04002-8/C·120

定价 19.00 元

序

■ 1

哈贝马斯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两巨册《沟通行动论》代表了他学说发展的一个高峰。在这本书里,哈贝马斯提出他的沟通行动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试图建立一个规范基础去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发展。哈氏用以支持和证成其沟通理论的论据相当复杂,牵涉不同学科和层次上的分析。在纵贯的层面上,他从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上去展现沟通行动论的可能性。他主要采纳的理论包括:韦伯(Max Weber)的西方理性化发展理论,其次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以及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马克思(Karl Marx)有关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至于在横贯的层面上,哈贝马斯利用“日常语言学派”(ordinary language approach)的分析方法去建构他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同时也跟随皮亚杰(Jean Piaget)和高贝(Lawrence Kohlberg)的结构发展心理学路向,去进一步说明和证成其所建立的社会研究的规范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看,哈氏的理论建构是企图建立一个有别于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然而,从传统的社会科学知识观来说,批判理论的弊端正在于它提出的规范基础。传统的社会知识观通过实证论清楚地展现出来。实证论强调社会知识的客观性是建基在价值中立社会研究的可能性上。从实证论的角度着

眼,客体与主体、事实与价值以及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逻辑上难以逾越的鸿沟。研究者越能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从事社会研究,其研究成果便越具有可验证性。这是实证社会研究的后设理论和方法学上的中心论旨。但对哈贝马斯来说,实证知识观所坚持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研究,反过来是彰显了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加深了现代社会的病态。

一如其他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论者,哈贝马斯对当代社会批判的重心,是针对着工具或科技理性对人类的控制。无论在学术圈子里或日常生活中,科技理性变成了“理性”的同义词。哈氏企图以“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代替此一狭义的“理性”概念。要达到此目的之第一步,是要对当代流行的理性观作严厉的批评。因此,他的讨论是以批评实证主义作起点。

实证论是当代社会研究的主流学派。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般人不自觉地接受的理性或知识观。哈贝马斯对实证论的批判主要针对两点:“科学主义”(scientism)和“科学的政治观”(a scientific politics)。科学主义认为所有知识的建构应该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典范,因为自然科学知识充分表现出其可以客观验证的特征。科学的政治观则认为科学知识是解决政治和日常事务上的问题的重要依据。现代政治里所特别强调的专家意见或专家统治充分显现了这一种政治观点。总的来说,实证主义是预设了知识的客观性,以及其与价值判断的划分,而在社会研究里,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是获得真确知识的重要条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哈氏对实证论的批评可以还原至是对“价值中立的社会研究”(value-neutral social inquiry)的批评。

哈贝马斯指出,实证论所坚持的价值中立社会研究,其实是不自觉地以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为分析架构。由这一个架构去

衡量,社会行为的客观性或理性基础是在于其手段能否满足其目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分析架构却同时预设了对人的存在本质和对“理解”一词的一些深远意涵。首先,这是预设了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人,利用外在世界的资源和工具去满足自己的目的。这一种分析架构和方法是以个人满足自己的欲望作出发点,个人以外的人或事物都是可资利用来满足欲望的工具。这里显现出一种人类存在的基本形态:以个人为主体,而其面对着的外在世界为客体,主客界限十分清楚。其次,从知识论的层面来考察,会发现这里也同时蕴含着一个可以名之为“笛卡儿典范”(Cartesian paradigm)的“单向理解”(monological understanding)模式。

哈贝马斯认为过往的社会研究总是跳不出单向理解模式,并由此角度去检视西方理性化的过程。这会导致一如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般的结论,认为人类最终会给科技理性完全控制。对哈贝马斯而言,这正好显示这些学者是如何受制于“单向理解”的研究模式,因而看不到人类其实有另一条可能的出路。他跟着指出,人类的存在并非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人作基础,而是以“双向理解”(dialogical understanding)的沟通作起点。

哈贝马斯尝试从其对人类言辞行为的分析里,显示出双向理解所蕴含着的人类真诚沟通的本质。他认为在人类使用语言的过程里,蕴含着追求真理的倾向;而真理通过反复讨论而达致的“共识”来界定。对这个“共识”(consensus)作进一步分析时,会发现这里涉及一个规范基础。这一个规范基础联系着一个没有内在和外在制约,只是有“更佳论据的力量”(the force of better argument)来指引的言辞情境。因此,言辞情境指涉着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脉络,而只有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里,才容许这样的沟通情境出现。^[1]换言之,在人的言辞行为里或人使用语言的情况中,已经显示出人类倾向追求一种重视自主性和

负责任的生活。这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论的起步点。倘若哈氏对语言使用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由这个起步点而建构出来的规范基础,并不纯然是不可验证的主观意念,而是有一定的客观理据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是企图以双向理解的知识观,替代科技理性及单向理解模式,并由此探索现代人逃离科技理性控制的出路。

本书里的所有文章都是在不同的角度和层次,环绕着这些问题来解读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论》。上述的简单引介希望能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沟通行动论的切入点。

本书中,“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论》”最初发表于谢立中主编的《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沟通理性的普遍意义”及“论批判的‘轻’与‘重’:读麦加菲与海尔的《批判理论》”发表于《社会理论学报》第1卷第1期(1998),“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几个方法论特征”发表于《社会理论学报》第3卷第2期(2000)。其他各篇则专为本书而撰写。

本书初稿承蒙翁正石作校对,谨表致谢。

阮新邦 林端

2000.12.10

注 释

- [1] Thomas McCarthy 对这一点有清晰的描述。参看“A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Paul Connerton ed., *Critical Sociology* (Middlessex: Penguin, 1978)。

序 [1]

阮新邦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论》

- 一、引言 [1]
- 二、语言本质与沟通理性 [2]
- 三、西方理性化发展的吊诡 [7]
- 四、“生活世界”、“系统”与理性化过程 [14]
- 五、“生活世界”殖民化 [22]
- 六、结语 [27]

黄结梅 解构哈贝马斯重建批判基础的工程

- 一、引言 [31]
- 二、哈贝马斯与早期批判理论 [33]
- 三、哈贝马斯的知识论 [36]
- 四、沟通行动论与批判基础的重建 [40]
- 五、总结：整项重建批判基础工程背后的代价 [48]

阮新邦 沟通理性的普遍意义

- 一、引言 [57]
-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59]
- 三、沟通理性的普遍规范基础 [63]
- 四、真理预设、理性论辩与社会解释 [70]
- 五、宏观批判社会理论的社会解释效能 [73]
- 六、结语 [77]

李洁文 从沟通理性角度解读韦伯的理性化理论

- 一、引言 [81]

二、行动、理性与现代化：韦伯的角度 [82]

三、行动、理性与语言 [87]

四、社会理性化 [92]

五、现代的困局 [96]

六、结语 [99]

林文凯 沟通行动与社会连带：哈贝马斯与涂尔干
社会理论之比较

一、引言 [106]

二、沟通行动理论：哈贝马斯对于涂尔干的重构 [109]

三、社会连带理论：涂尔干的道德与法律理论 [124]

四、结论：理性与感性 [135]

谢立中 行动和系统的联结：哈贝马斯论帕森斯的
理论失误

一、引言 [145]

二、从规范化的行动理论到社会的系统理论 [149]

三、系统理论的发展与对行动理论的修正 [157]

四、帕森斯现代性理论的局限 [165]

五、结语 [169]

渠敬东 从意识哲学到沟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与
工具理性批判

一、引言 [172]

二、理性化与物化 [175]

三、范式的变革 [181]

四、沟通理性与批判理论 [188]

何明修 沟通行动理论与市民社会

一、引言 [201]

二、哈贝马斯：从公共领域的论理到生活世界的沟通 [202]

三、市民社会问题的重新提出 [209]

四、沟通行动理论的市民社会模型 [212]

五、讨论：市民社会的共识与自主性 [218]

童世骏 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几个方法论特征

一、引言 [231]

二、普遍主义的预设 [232]

三、双重结构的范式 [240]

四、三个向度的旨趣 [247]

五、结论 [257]

吕志伟 论批判的“轻”与“重”：读麦加菲与海尔的
《批判理论》

一、引言 [262]

二、批判理论的困境 [263]

三、异同之间 [265]

四、轻重之别 [268]

五、“现代性”、“启蒙”与“批判”的意义 [271]

六、结论：论争的不可共量性与批判理论的发展 [274]

作者简介 [280]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论》

■ 1

阮新邦

一、引言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批判理论近 20 年来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显学,其学说涉猎之广和深可以说是罕有比拟的。但颇为吊诡的是,哈氏的理论却在一定程度上跟 20 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主导思潮相违背。今天,“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论”可以说是对现代人影响力最大的两股相辅相成的思潮。这些学术思潮跟 20 世纪下半叶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甚而是人类日常生活上的理念和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相互影响。特别是近年来流行的“文化多元论”,似乎更是把学术层面的理念和社会、政治以及日常生活层次的事项连结起来。当然,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论,跟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潮的关系十分复杂,不能作简单的化约。然而,所有这些理论和情境都是在传递着一个信息,这不再是一个由绝对和普遍的准则去评估和指引人类行为的年代了。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论”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气候里提出来的。哈氏的理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其中最受争议的地方是他企图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基础”(normative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论》

foundation)来描述、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

“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是哈贝马斯学说的中心概念,并且也是哈氏用来支持其理论的普遍性的主要论旨。然而,亦正好在这里引来不同学派的强烈的批评。哈氏用以支持和证成其沟通理性的论据相当复杂,牵涉不同学科和层次上的分析。由纵贯的角度着眼,他跟随帕森斯早期的研究路向,试图从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上去指出沟通理性或沟通行动论的可能性。其中对他这方面的理论影响特别深的,是韦伯的西方理性化发展理论,其次是涂尔干、米德以及帕森斯和马克思有关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在横贯的层面上,哈贝马斯引用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分析,建立他的“普遍语用学”理论,同时也跟随皮亚杰和高贝的结构发展心理学,以此来进一步说明和证成西方理性化的进程,是具有一种进化色彩的发展方向。

哈贝马斯的近著《沟通行动论》,^[1]可以说是他在这方面理论的最完备及最系统的论述。本文主要是通过这本书介绍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由于哈氏的讨论相当艰涩难懂,因此在下文里,在有需要时会引入他较早期的论点,并且加上本文作者的进一步演绎和解说。^[2]

二、语言本质与沟通理性

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强调一种价值中立的生活态度,强调个人在一切价值问题抉择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事实上,在学术研究和在日常的事务里,都显示出价值问题到最后是没有客观讨论的余地的。现代社会组织里的科层结构(bureaucracy)形态,以及组织内的“非人化”统治特征,处处表现出此种现代性的特质。对很多批评现代社会结构的学者来说,这些特

质其实是同时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病态。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论的中心论点,是批判“科技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对人类的控制。在现代人的心目中,“科技理性”变成了“理性”的同义词。哈贝马斯用以抗冲“科技理性”当道的方法,是企图以“沟通理性”代替现时狭义的“理性”概念。他的讨论以批评“实证主义”作起点。

实证论是当代社会研究的主流学派。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般人不自觉地接受的理性或知识观。实证论有两个基本假设。^[3]首先,实证论者以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研究的典范。他们认为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还原至一些“基本现象”(brute fact),所谓“基本现象”是指研究者只需要依赖纯感官的触觉,而不用加上任何演绎便可以了解的现象。由于实证论者相信人的纯感官具有客观性或互为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而任何“事实陈述”都是建基于不用演绎的基本现象上,因此,事实陈述可以通过没有价值介入的纯感官的触觉而被客观验证。实证论的第二个假设是,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一个理论或语句的真假值,是取决于该理论或语句的描述是否跟外在世界吻合。这是有名的“相应真理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

哈贝马斯对实证论的批判主要针对两点:“科学主义”(scientism)和“科学的政治观”(a scientific politics)。^[4]“科学主义”认为所有知识的建构应该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典范,因为自然科学知识充分表现出其可以“客观验证”的特征。“科学的政治观”则认为科学知识可以客观地解决一切政治和道德上的问题。现代政治里所特别强调的专家意见或专家统治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种政治观点。很明显,这里是预设了知识的客观性,以及其与价值判断的划分。这是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其重点是强调知识应

局限于具有客观验证基础的研究范围内,而价值及道德问题是不能客观验证的,因而也不是知识,只是代表个人的主观看法。因此,要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才可以获致真确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哈氏对实证论的批评可以还原到对“价值中立社会研究”(value-neutral social inquiry)的批评。

在对实证论展开严厉批判之余,哈贝马斯尝试从正面的角度以其“共识真理论”(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作基础,去抗衡实证主义的验证程序和相应真理论,并希望由此建构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基础”,来理解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

首先,哈贝马斯和其他非实证论者指出,“社会现象”(social reality)与自然现象(natural reality)有本质上的分别。前者是由相关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所构成的,因而不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程序去检视或证成(justify)社会科学理论。其次,根据哈贝马斯的共识真理论,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绎,而语句的真假值是由参与讨论者在相关的社群规范制约下达致的共识(consensus)来决定的。此一真理观假设人有进行理性讨论的能力,而共识是参与讨论的人在无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和制约下进行讨论而达成的。这样的讨论“条件”只能在一个容许自由讨论的社会或“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才可以出现。在哈贝马斯心目中,这里其实蕴含着一种人类所希冀的理想生活方式,一种没有内外制约的真诚沟通的人际关系,而此种关系可以从没有制约的理性讨论的角度来理解。这里同时显示出哈氏的社会批判论所预设的价值理念。

哈贝马斯企图通过对语言本质的分析来证成他的论点。简言之,哈贝马斯认为对这些道德理念的追求“先验”(a priori)地存在于语言的使用里。在人类使用语言沟通的过程里,已经显示出人是追求此种理想生活方式的。我们懂得运用第一句语言

和别人沟通或者要达致了解(reaching understanding)的时候,已经显示出我们是在追求一个普遍而没有制约的共识了。换言之,“达致了解”是潜藏在人类语言里的一个“目的”(telos),而这个目的进一步蕴含着一个没有任何制约的“理想沟通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5]

在“理想沟通情境”或者是在语言的使用里,有三个有效宣称(validity claims)规范着语句的使用或人的语言行为(speech act);这些有效宣称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些必要的条件,使说话者可以正确地运用语言跟别人沟通。第一个是“真理宣称”(truth validity claim):在认知(cognitive)层面的沟通过程里,我们期望所使用的句子能够反映外在世界的事实,并且通过这些认知句子把相关事实告诉别人;因此,这些句子的“有效性”取决于其能否表达事实的真相。第二个是“正当宣称”(rightness claim):正当宣称是语言使用者和别人沟通时,要遵守支配着人与人沟通的社会规范,人际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规范构成的;因此,在使用语言作相互沟通的时候,我们要遵守制约着这些语句的规范,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合理和正当地使用这些语句和别人沟通。最后是“真诚宣称”(sincerity claim):我们使用的句子是希望别人相信这是真诚地表达我们的内心想法和感觉的。^[6]

哈贝马斯以“沟通”(communication)和“沟通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对此作进一步的解说。为了达致目的或满足一己的欲望,我们很多时候会用语言跟别人沟通和协调行为。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正在从事“沟通行为”。因为我们虽然是跟别人沟通和协调资源的运用,但倘若我们协调的手法是欺诈或只是以满足一己欲望为最终目的,那么,这只是用沟通作手段去满足自己的欲望罢了。哈氏认为一个社会行为是否属于“沟通行为”,主要取决于行为者所用的协调(co-ordination)方法。^[7]如果

其所用的方法是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达致相互理解的沟通,并由此而协调资源的运用,去满足各自的欲望,这便是属于“沟通行为”。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在现实的人际沟通里,大多数人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目的去做协调工作。因此,从哈氏的角度看,这都不是“沟通行为”。那么,哈氏提倡的沟通模式是否只是一种理想,又或者只是他个人的道德取向呢?事实上,哈氏的普通语用学或者他的整个学说,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道德规范或标准去理解和分析社会行为。从以上简单的分析看,哈氏似乎无可避免地要承认他提出的沟通模式是一种“理想”,并且也是一种“道德取向”。但在面对现实层次上人际的欺诈和扭曲的沟通时,哈贝马斯如何证明他的理想沟通情境其实已经存在或潜藏在现实的人际交往里呢?

其实上文有关有效宣称的分析已经对这一个问题作了初步的响应。现在尝试作进一步的解说。在人际的沟通过程里,当然可以有扭曲或真诚的理解。然而,另一方面,就算在扭曲或相互欺骗的理解里,理解者在第一步的沟通层面上,是要令对方明白自己言辞的意义,否则也不能达到欺诈的目的。基于此点,沟通者要遵守如哈氏所指出的那些沟通原则。当对方不明白该言辞的意义时,沟通者要反复解说。因而,起码在这第一步的沟通层面上,是要依赖哈氏所说的“更佳论据的力量”(the force of the better argument),那是说用论证来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在这意义下,我们可以说在第一步的沟通层面上,“令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是唯一的目标或准则,指引着反复的讨论。

现在我们可以把上述的分析作一个简单的综合。哈贝马斯对人类言辞行为的分析,显示出人在使用语言时,蕴含着追求真理的倾向;而“真理”是由通过反复讨论而达致的“共识”来界定

的。对这个“共识”作进一步分析时,会发现这里涉及一个规范基础。这一个规范基础联系着一个没有内在和外在制约,只有“更佳论据的力量”来指引的言辞情境。因此,言辞情境指涉着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脉络,而只有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里才允许这样的沟通情境出现。换言之,在人的言辞行为里或人使用语言的情况中,已经显示出人类倾向追求一种重视自主性和负责任的生活。这是哈贝马斯社会批判论的起点。倘若哈氏对语言使用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由这个起点而建构出来的“规范基础”并不纯然是个人的主观意念,而是有一定的客观理据的。^[8]这便是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的重点所在。

三、西方理性化发展的吊诡

从现实的层次看,近两三百年西方历史的发展似乎并非以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作主导。反之,我们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科技理性控制着人类的活动。此一发展主要由启蒙运动引发。毋庸讳言,启蒙运动以后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人类带进了一个极丰裕极舒适的物质世界。生、老、病、死,虽然仍然是逃避不了的事情,但在一定程度上,从物质的角度看,此等人生阶段带给人的痛苦是大大地减弱了。这似乎是人类长久以来希冀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生活。18世纪启蒙运动所要建构的“现代事业”(the project of modernity)也似乎实现了。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是物极必反的。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享受着高度物质生活的现代人,慢慢地发觉“现代事业”并非如最初想象那样完美。自五六十年代起,科学技术更向前迈进一大步,人类的物质生活更臻完善。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精神活动却日见萎缩。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论》